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化理论为方法 化理论为德性

对冯契一个哲学命题的思考与探索

彭漪涟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化理论为方法 化理论为德性

对冯契一个哲学命题的思考与探索

彭漪涟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化理论为方法 化理论为德性:对冯契一个哲学命题
的思考与探索/彭漪涟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ISBN 978-7-208-07902-1

I. 化… II. 彭… III. 冯契(1915~1995)-哲学思
想-研究 IV.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4928 号

责任编辑 李 卫

化理论为方法 化理论为德性

——对冯契一个哲学命题的思考与探索

彭漪涟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4.75 插页 4 字数 173,000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902-1/B·653

定价 25.00 元

序

黑格尔曾用“黄昏起飞的猫头鹰”，比喻人只有到老年，才进入思想的金秋。我一直以为，黑格尔此话并不具有真理性，至少，它对彭漪涟先生不适用。因为彭先生在退休之前就佳作不断。然而，当彭先生搁下教鞭后，接二连三地推出一本本睿智而充满情趣的著述，尤其是当他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对冯契一个哲学命题的思考与探索》摆在我面前，让我在先睹为快中顿生敬佩之情时，我才真切体会到黑格尔此话的含义。

冯契先生是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一面旗帜，他的理论博大精深。“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冯先生半个世纪前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而生发的哲思。这看似平常的两句话，既高度浓缩又集中体现了冯先生的哲学理念。因此，考察“两化”在冯契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把握它的基本内容及其关键环节，揭示它与智慧说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评价它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功能，展现它的创立者对此的践履风貌，对于我们这些后学晚生，如何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冯契哲学思想，如何弘扬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如何达到“为学”与“为人”的统一，都是一件极具意义而又不易的事情。现在，这件事情却由已入古稀之年的

彭先生完成了。

很长时间我都以为,冯先生提出的“两化”,是他对自己长期致力的教学与科研的有感而发。然而,彭先生对“两化”产生的历史的、现实的、理论的、实践的等背景的详尽追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良知的思想家,是如何在总结近代“古今中西”的争论中提出这一观点,而这一观点又怎样在历经磨难中日臻成熟的;让我们了解了一个胸襟开阔、敏思善思的理论家,是如何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将两个层次的“理论联系实际”,用既言简意赅又极富哲理的话语表达出来的;让我们明白了哲学之为哲学,哲学家之为哲学家,他生存、成长的土壤,在其时代、在其生活世界、在其举止言谈中。

就字面而言,“两化”不过12个字,且明白易懂。然而,从彭先生对这一思想的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主要环节的全面展示和深入挖掘中,我们了解了一个视求知求真为天职的思想家,何以如此看重,又是如何看待“方法”的真谛,以及应“化”之义、所“化”之途的;让我们认识了一个追求真善美统一人格的思想家,何以要从“德性”而非“德行”谈论“化”之价值,如何既唯物又辩证、既宏观又微观地揭示出“德性”的内涵,以及“化”之必然性、现实可能性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对冯先生“两化”思想融会贯通的思想家,又是如何通过其入微的分析,而使“两化”更具操作性的。

知识与智慧及其关系,是冯先生终其一生都在研究的问题,也是先生学术成就的重要方面。认识先生的理论,首先要涉及他的《智慧说三篇》。然而,《智慧说》与“两化”,其间有着怎样的联系?理解这种联系对于认识冯契哲学有着怎样的作用?是研究冯契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从彭先生对“两化”与冯先生的智慧学说的关系的条分缕析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学养厚重的思想家,是如何在准确界定知识与

智慧,分析两者的区别与联系中,探讨其间的转化关系的;认识到一个富于创新的思想家,是如何通过智慧学说为“两化”奠定认识论基础,又如何通过“两化”使智慧学说,成为人获得自由的手段,以及“两化”何以是智慧说的基本原则的:“智慧说”既是从静态研究“性与天道”的真理性认识的认识,又是从动态研究人的认识如何“转识成智”。它引导人们进而认识和改造客观、主观的世界,达此的途径,就是“理论”成为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完善与发展人的主观世界的方法,使“天道与人道”,成为人的德性,从而表明,“两化”既是智慧的内在要求,又是检验智慧的价值标准。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倡导的学风,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途径。然而,在中国,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的革命还是在建设中,人们关注较多的,往往“联系”的是改造客观世界一面,而对如何通过学习理论,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进而改造主观世界,却关注不多。从彭先生对“两化”提出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得知了这一口号,是如何从理论方面补充和完善了党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口号,并使之具体化的。而彭先生对“两化”内涵的深入分析,则让我们更为透彻地了解到,“两化”彰显的理论可验性,理论作为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的统一性,理论的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的一致性等品质,确确实实是冯契哲学思想的精华,而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又实实在在地起着推进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留给了我们用之不竭的精神遗产,“天人合一”的“古为今用”,是当今学界的时尚。但时尚并不表明人们对其解读的正确。然而,通过彭先生的分析,我们得知了有着中国传统文化厚重底蕴的冯先生,是如何对这一充溢封建气息、饱含传统伦常的理论,做出了富有时代色彩的科学理解的,是如何通过“两化”,找到了一条

打通天人关系的通道,从而为重新解读、科学解决天与人的关系问题,提供新思路的。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对峙,既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常态,也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折射到我们的学界。例如,深受苏联教科书模式的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曾只重客观必然性而轻主体选择性、只重科学理性而轻人文价值,并一度成为我们的教学与科研的通病。这种疾病的实质,则是科学与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与人生、理智与情感的脱节。冲破这种禁锢,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学者的智慧,更需要学者“下地狱”的勇气。冯契先生做到了,其标志就是“两化”。然而,对于“两化”是如何弥合这种裂痕,化解这种对立的,研究冯契哲学的人们,似乎未曾有过认真的思考。从彭先生的分析与概括中,我们了解到,“两化”特别是“化理论为德性”,由于它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凝道而成德,显性而弘道”的过程,因此,它能够使人,在达到理性的自明、意志的自主、情感的自得中,逐步克服科学与人生的分裂、理智与情感的脱节,而进入科学与人文的合一境地。

“为学”与“为人”的统一,之所以历来为学人关注,不仅因为它是学人追求的理想境界,而且是衡量学者学问的标准之一。彭先生在总结和辨析中国先贤的思想传统中,正确指出了“两化”才是学人达到“为学”与“为人”相统一的最为有效的途径。这一途径之所以有效,就在于它从理论与方法、理论与德性的相互联系中,向人们指出了如何在学习和研究理论的过程中,获得通往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桥梁,而达致两者的统一。然而,理论阐述的深刻,或许还不足以让我们深刻了解“为人”与“为学”的真谛。但通过彭先生在本书最后一章的全方位勾勒,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思想家,是如何将“两化”溶入生命,如何在实现“为学”与“为人”的高度统

一中，拥有博大情怀、坚持自由思考，而展示出一个大写“人”的精神风貌的。

“何须浅碧深绿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我想，用李清照此词形容彭漪涟先生为弘扬冯契哲学所作的贡献，并不为过。

郑忆石

2007年11月5日

目 录

序	1
代绪论 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的一个重要环节 ——论重提“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必要性	1
第一章 “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提出及其在 冯契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13
一、“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在冯契哲学思想和 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13
二、“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提出的历史根据和 思想传承	30
第二章 “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基本内容、 要求和主要环节	43
一、“化理论为方法”的基本内容、要求和主要环节	43
二、“化理论为德性”的基本内容、要求和主要环节	55
第三章 “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与冯契的智慧学说	76
一、冯契智慧学说简介	76
二、“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与冯契智慧学说的 内在关系	92

第四章 “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理论意义与

现实意义	101
一、“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	
——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的两个“补充的口号”	101
二、“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	
——理论本身内在品格的必然要求	105
三、“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	
——实现为学与为人相统一的有效途径和关键环节	114
四、“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	
——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说的新解读	123
五、“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	
——化解和克服科学与人生脱节的重要思路	133

第五章 冯契——“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忠实

践行者和模范体现者	145
一、一个始终坚持智慧的探索、建构了独创的智慧说	
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145
二、“化理论为方法”在冯契哲学研究中的体现	152
三、“化理论为德性”在冯契为人与为学中的鲜明体现	158

【附录】

漫谈为人与为学的几个问题	168
冯契对孔子的仁智统一学说及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	
深刻评析	185
《菜根谭》的为人与为学观	196
“化理论为方法”的系统阐发	
——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一书简介	211
后记	221

代绪论

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的一个 重要环节

——论重提“化理论为方法、
化理论为德性”的必要性

坚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是我们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项根本任务。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要按照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进一步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1]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由于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行动指南的党，因此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针，必然成为我们党能否保持其先进性、能否有效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大问题，从而也必然成为全党能否巩固和发展近几年

来开展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已取得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一个关键问题。

早在60多年前,毛泽东就曾把学风问题视为“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2]并把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态度和学风,归结为是一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方法”,斥之为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3],号召人们有打倒它的必要。

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我们党三代领导的大力提倡和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我们在学风上,在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方面,无疑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的不少理论工作者也通过自己的长期理论活动的实践和探索,在总结我国优秀传统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对此做出了深入的研究,从而对如何具体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如何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为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在学风问题上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国当代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契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以下简称“两化”),可以认为就是这方面成果的一个突出表现和重要标志。

“两化”是冯契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而提出的。它是在肯定学习理论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前提下,着眼于理论工作者如何科学地对待和运用自己所学习与研究的理论这一问题而提出的。其直接用意则在于说明:对于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首先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和研究的同志来说,理论联

系实际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运用理论作为方法，贯彻于自己的活动和研究领域；另一是运用理论来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即通过对理论的身体力行，使理论转化为自己的德性，具体化为有血有肉的理想人格。

冯契所以会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两化”的要求，并不是偶然的。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不久，人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热情很高，各级干部以及广大理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愿望尤为迫切。然而，他们通过初步学习虽然大都知道应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是，基于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新中国成立前，面对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战争环境；新中国成立后，又面临复杂、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长期以来对这一方针的贯彻主要着眼于改造客观世界方面（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而对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方面，则关注和强调得相对较少（这一点，只要回顾毛泽东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一系列重要报告就清楚了），以致许多人对于如何从自己入手，即如何从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入手来贯彻这一方针，认识上不够明确，思想上不够重视。这实际上也妨碍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冯契提出了“两化”的要求，作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的补充口号，具体回答了理论的学习者、研究者如何从自身入手贯彻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方针的问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两化”实际上是对贯彻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方针在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的一种科学回答，是对理论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如何从自身入手正确认识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方针所指明的有效方法和重要途径，是这一方针和原则在新形势下的丰富和具体化。

正因此，“两化”提出以后，虽然历经“左”的思潮的多次批判，但

没有被批倒。相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和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两化”更日益显示出其独特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可以说,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值得倡导的科学学风。

“两化”指明,就理论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应当主要从两方面入手:把理论转化为方法和把理论转化为自己的德性。前一方面说明,用理论去联系实际,即用理论去认识现实和变革现实,决不是面对实际生搬硬套某种理论,更不是视理论为教条或教义而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地去照抄照搬,而是应该在深刻理解科学的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使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改造世界和发展自我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提供了这种转化的可能性)。然后,再运用这种方法进一步去指导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而由于任何一种方法作为联系主客观的中介本身就包含着一定行动的正确程序和原则,因此只有遵循这种程序和原则,人们才有可能找到认识和变革现实的有效途径,从而才能正确而有效地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功能。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以要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存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的根本原因。

后一方面是说,要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还必须用理论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塑造自己的人格,使理论转化为自己内在的德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统一,提供了这种转化的可能性)。就此而言,理论不仅仅是一种可供使用的武器、变革现实的工具和手段,理论本身还有其内在价值,它可以内化为人的品性,从而

体现一个人的人格,表现一个人的个性。为此,就要求人们在学习和研究理论的过程中必须坚定地信守和践履理论的信念,真诚地、锲而不舍地在自己的言论、行动和一切社会交往中去贯彻理论,不断克服种种背离各种科学理论的异化现象的干扰,在刻苦磨练的过程中做到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使之习以成性,从而使理论逐渐内化为自己的德性,造就自己体现着理论品格的个性和人格来。

以上说明,做到“两化”是科学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是理论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有可能充分发挥理论功能的必由之路(理论只有化为方法,才能充分发挥其固有作用;理论只有化为德性,才能实现其内在价值)。而背离“两化”的要求,也就背离了科学理论本身的内在品格,从而也就谈不上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联系实际,自然也就谈不上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

也因此,坚持“两化”在当前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坚持“两化”有助于在开展经常性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更充分地发挥理论的固有作用,从而更有力地促进党风、学风的建设和端正,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增强和提高党的反腐倡廉能力和执政能力。

党风、学风问题,首先是全党干部的作风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党风、包括学风问题上却也存在着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一些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他们身居高位,肩负重任,却不修为官之德,不存立党为公之心,不立执政兴国之志,不创勤政为民之绩,而是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大打个人的小算盘,大搞权钱交易,并在金钱、美色的诱惑下,陷于泥潭而不能自拔;以至于在一些单位、一些地方,腐败之风盛行,歪风邪气丛生。究其原因,虽有许多方面,但缺乏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的科学态度,没有确立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正确学风,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各地所揭露出来的那些贪污腐化分子、官僚渎职分子的经历来看,他们大多是一些学风极端不正的人。他们虽然在现职的任前任后,大都经历过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教育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而且他们大多能经常聆听到中央的声音(包括关于干部修养、党的纪律等方面的指示和讲话),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那不过是一些可以被他们用来装点门面的东西,是对人不对己的。他们可以在公开的场合大讲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忠诚,对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坚定决心和对党的纪律的信守不渝,背后却可以把他们讲的“忠诚”、“决心”抛得一干二净,大干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种种罪恶勾当。在这些人那里,理论对实践所固有的指导作用,特别是理论对人的教育、教化作用以及作为科学的价值判断的作用,几乎等于零。这无疑正是这些人虽然长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但在行动上却与之背道而驰,走向腐化堕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全面巩固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5]也是完全正确的、及时的。为此,继续加强对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环。既然如此,在此过程中大力提倡“两化”要求,无疑也是适宜的,它有助于提示广大干部在认真学习和理解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的基础上,把理论转化为相应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比如,转化为用以指导自己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以把握实际情况的方法,转化为用以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决策、施政的方法等),并用理论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培养自己健全的人格,以常修为官

之德，常存立党为公之心，并使之习以成性，使理论转化为自己的德性。如能做到这样，我们的广大干部自然就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经常地、不断地从自己所学习的各种理论（首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中央结合当前我国国情而提出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并用以经常地、不断地净化自己的灵魂，明确前进的方向，坚定自己为党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终生的信念。在此基础上，他们自然也就能够不断提高自己识别和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侵袭的能力，就能及时冲刷掉那些随潮流裹胁而来的污泥浊水，始终充当带领群众永远奋进的弄潮儿，从而极大地提高全党的战斗力，尤其是执政能力。

其次，“两化”是继承先哲优良传统、坚持为人与为学相统一，抵制和克服当前学术界种种不正之风、加强我国学术理论队伍建设的有力武器。

我国古代思想家大都有着德智结合，为人与为学相统一的传统。《中庸》谓“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虽然历代思想家对“尊德性”与“道问学”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强调二者的一致和统一则是共同的。他们都认定只有做到这二者的统一才能称得上是“君子”（具有理想人格的人）。我国当代已故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金岳霖在谈到我国古代哲学家时就曾明确强调这一点。他说：“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意即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坚持实践自己所倡导的思想和理论的那一类人物——引者）……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6]而冯契“两化”的提出，不仅再次强调了“尊德性”和“道问学”、为人与为学的统一，而且还为实现这种统一指明了具体途径：化理论为方法，以把握“道问学”的有效方法而促使为学日进；化